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及其启示

杨涵睿^a, 梁秀波^b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a. 研究生院; b. 移民管理学院,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 其移民政策发展历时漫长、结构较为系统。18世纪末至今,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历经殖民主义、“白澳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后多元文化主义四个时期。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三方面分析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发展动因, 认为其移民政策变革具有围绕国家利益、政策灵活、手段丰富等特点。我国可从关注国家整体利益、注重政策主动构建、优化移民管理体系、深化国际社会协作角度出发, 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予以借鉴。

关键词: 澳大利亚; 移民政策; 变革; 动因; 借鉴

中图分类号: D63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0900(2024)09-0012-06

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 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移民政策不仅对国内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还在国际舞台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旨在研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发展历程, 分析其发展动因和特点, 为我国移民政策制定、调整提供参考。

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历程

(一) 殖民主义时期

1788年1月26日, 英国的第一支罪犯遣送船队在悉尼登陆。同年2月7日, 英政府宣布澳大利亚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因素影响, 在1820年以前澳大利亚对自由移民的吸引力不强。此时, 生产活动主要依靠被流放的犯人进行。由于缺少生产经验、劳动积极性低, 导致粮食供应不足, 政府开始引入具有生产经验的移民来发展农牧业。

随着殖民地的探索扩张, 需要更多劳动力来进行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1]。因此, 英国政府开始制定吸引移民的政策, 其在欧洲宣传澳大利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将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新移民的津贴, 鼓励更多的士兵、罪犯、农民和商人来澳。在此时期, 澳大利亚的移民主体逐渐由被流放犯人转向自由移民。

随着淘金时代的到来, 澳大利亚吸引了大量移民。1851年至1888年间有超过100万人抵澳^[2], 数万名华人也前往澳大利亚淘金。由于华人劳工吃苦耐劳且工资低廉, 引发白人劳工的不满, 多次爆发“排华”暴行, 当地白人要求政府对华人劳工进行限制^[3]。为保护白人种族的利益, 英国政府通过征收入境税、剥夺其他族群已有利益及限制入境人数等政策对其他族群人群进行限制打压。随着“淘金热”的消退, 以及经济萧条时代的到来, 澳大利亚移民数量逐渐减少。

收稿日期: 2023-09-22

基金项目: 202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移民全球治理研究”(HB21GJ001)

作者简介: 杨涵睿(2000—), 男, 陕西商洛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梁秀波(1976—), 男, 河北廊坊人, 教授。

在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由起初劳动力不足而鼓励移民到来的自由移民政策逐渐转向以种族特征为界定标准的限制移民政策,这些种族歧视政策即“白澳政策”的端倪。

(二)“白澳政策”时期

“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政策之一,其目的是阻止中国人和其他“非白人”永久定居,主要通过“听写测试”、强制遣返南海岛民以及入籍申请限制来实现。随着1901年《移民限制法》《太平洋岛屿劳工条例》和1903年《入籍法》等法律规定实施,澳大利亚“白澳政策”法律体系逐渐形成。

1940年代,澳大利亚国民对这种种族歧视主义的移民政策表示反对。在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不增加人口就灭亡”的局面,劳动力市场严重短缺,被迫逐渐放宽对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4]。1948年,澳大利亚颁布《国籍和公民身份法》,确立了澳大利亚公民身份。1958年,澳大利亚颁布《移民法》,取代1901年《移民限制法》,限制非白人移民的“听写测试”措施被取消。1966年,在国内两党均对移民持支持态度影响下,澳大利亚对移民相关政策进行修改。相较于之前严格限制种族与国籍,新政策更关注申请人是否适合定居、融入社会的能力和专业技能。据统计,1956年至1969年间,有1.1万非白人移民获得国民身份^[5]。

随着亚非国家移民数量的增多,其在当地形成要求废除“白澳政策”的民间组织,也促使澳大利亚从国家法律层面废除对移民的种族歧视政策。然而,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采取种族同化政策,企图让移民尽快认同澳大利亚文化,从而形成单一的澳大利亚文化社会,但这种近似于种族灭绝的政策注定遭遇失败。1972年,惠特拉姆总理对种族限制政策表示坚决反对,并承诺进一步改革移民措施,消除法律中的种族歧视条款,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时任移民部部长阿尔·格拉斯比表示:“白澳政策已经死了,给我一把铲子,我会把它埋掉。”政府对公民身份标准的立法进行修改,允许所有移民,无论种族或出身,在居住三年后都可以申请澳大利亚公民身份。

在实施“白澳政策”的前期阶段,澳大利亚移民数量呈现负增长趋势,致使面临人口困境。二战后,受多方压力影响,政府逐渐放宽移民限制,“白澳政策”最终得以废除,移民政策进入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三)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1973年,时任移民部部长阿尔·格拉斯比在题为“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同年11月,澳大利亚宣布正式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惯与生活方式。《澳大利亚公民权法案》与《反种族歧视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反对种族歧视,多元文化主义强烈影响澳大利亚几十年间的政策制定。政府首先推出“豁免”计划,共有8600多人申请,这些签证逾期移民身份实现了合法化。随着移民政策的放宽,澳大利亚自愿移民数量高于政府所需求数量。由于国内经济出现衰退,政府出于对失业率的考量,减少了移民配额^[6]。1975年,澳大利亚的移民配额仅剩5万个名额,处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弗雷泽政府上台后,继续强调多元文化政策,并大幅增加移民数量。1979年,移民和民族事务部(DIEA)开发了用于移民选择的多因素评估系统(NUMAS),此系统将家庭关系、职业和语言技能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对移民予以赋分。虽然以数据为基础的积分型评估系统体现了“非歧视性原则”,但考量范围过于宽泛,实施效果未达到澳大利亚对技术移民的期待。因此,政府颁布《1982年移民法案》,并将多因素评估系统进行调整优化,提出新的移民评估体系(Migrant Assessment System),放宽技术移民准入条件,但对申请者的受教育水平、英语及专业技术能力更加重视。

在霍克政府时期,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澳大利亚经济低迷,公众对移民政策不满。澳大利亚国内认为:只有具有高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国民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形势。在此时期,经济移民和技术移民在整个移民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7]。为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澳大利亚,政府于1984年推出商业移民项目,规定商业移民必须携带一定的资金。这一政策也吸引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大量亚裔商业移民到来,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就业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费茨杰拉德报告和加农特报告出台,以技术移民为中心的移民政策正式形成,这一政策将技术移民视为“人力资本”,更加重视移民的“质量”。在国内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目标明确,走向以技术移民为中心的后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四)后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后多元文化主义时期移民政策的中心是技术移民。1996年霍华德政府上台前,澳大利亚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对移民的反对态度进一步增强。霍华德上台后,表明移民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限制家庭团聚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并增加技术移民的配额。政府首次发布技术职业清单(SOL),包含医生、教师等大部分专业技术和管理技术职业。技术移民申请者必须符合清单中所列出的职业,否则不予通过。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年轻移民群体进入澳大利亚可以增加劳动力,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截至2004年6月底,澳大利亚发放171 618份学生签证,创历史新高^[8]。2007年,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DIMA)更名为移民和公民事务部(DIAC)。这表明霍华德政府刻意淡化“多元文化”,更加注重公民身份。移民和公民事务部将澳大利亚的入籍所需等待时间延长至4年,同时实施入籍考试制度,要求移民充分了解英语、澳大利亚历史和生活方式。

在陆克文政府时期,技术移民所占配额比重仍保持高位。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连续2年下调移民配额。为挽救国内经济,政府将技术移民政策方向调整为“需求—驱动”模式,为最符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各州、领地政府担保的技术移民开启“绿灯”。2010年,澳大利亚发布新技术职业清单,削减原来的职业种类,将会计、木匠、电工等专业职业纳入其中。为更好地匹配移民申请人、雇主及政府的需求,推出新的移民技能选择系统“SkillSelect”,此系统给予移民和公民事务部选择技术移民的权力,更加注重移民的学历、英语水平和工作经验,改变此前达标就可获得身份的政策^[9]。在对非法移民的控制和接纳人道主义移民方面,政府延续之前的严格限制政策,严格限制抵澳的难民船只数量,实施“主权边界”行动,对由海上非法来澳的行为零容忍,继续推行境外拘留措施^[10]。

近年来,澳大利亚为推动偏远地区发展,放宽偏远地区技术移民限制,推出新的偏远地区签证,允许技术移民在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五年,并在各自的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三年后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2021年,澳大利亚为能够作出重大经济和就业贡献的企业重要员工推出“后新冠肺炎经济复苏活动”签证,以使其不受澳大利亚严格的新冠肺炎边境管理措施限制,尽快恢复工作,推动经济发

展^[11]。在2022—2023年的移民计划中,永久移民配额从之前的16万提升到19.5万名,创下澳大利亚移民配额的最高记录,且技术移民占据总配额的70%左右^[12]。未来,澳大利亚的移民重心仍会是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移民群体,为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取得优势,移民政策将会为高技术人才提供更多便利。

二、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的动因分析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下面主要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国家形象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改变人口结构

移民政策的实质是是否接收移民、接收多少移民以及接收什么类型的移民。人口结构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移民可以改善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政府通过多种措施调整移民流动,改变人口结构,强化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澳大利亚目前人口为2 600万,至2019年出生在海外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0%。国际移民组织(IOM)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已成为世界第九大移民国。

起初澳大利亚被作为英国流放罪犯的地区,到“淘金热”时期到来,自由移民数量已经占据大多数。在“白澳政策”时期,澳大利亚排斥有色人种,人口多样性受到限制。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不增加人口就灭亡”的局面,政府逐渐放宽移民限制,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这一时期亚裔移民人口比例不断上涨,白人群体比例下降。近年来,以技能和教育水平为重点的移民政策愈发受到政府重视,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也由“供给—导向”型转向“需求—驱动”型^[13]。移民群体的主体也趋向年轻化、高学历、高技术化,政府还允许符合条件的留学生群体申请永久居留,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澳大利亚移民年龄中位数为27岁,在20岁的移民中,84%为国际学生^[14]。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发展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促成当今澳大利亚的繁荣局面。

(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移民的到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移民是澳大利亚从建国至今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且从长期角度来看,移民数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英国国内的工业革命推动了澳大利亚牧羊业迅速发展,这也使得英国国内资本改变对澳大利亚的认知,资本家也移民至澳大利亚经营牧羊场。随着国内矿产资源被发现,澳大利亚吸引企业家、银行家、技术工人、知识分子等大批移民,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大量资本,实现国内经济的腾飞。二战后,澳大利亚获得独立的经济、外交权,开始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移民的到来使得国内消费市场扩大,生产力提升。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不断推动经济转型,移民政策倾向于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技术移民既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政府节省大量的教育培训资金。商业移民带来资本,其在澳大利亚投资和创业,提供重要的就业岗位和税收来源,并且由于商业移民与其来源国之间关系,其在拓展国际市场、争取外资和开展技术合作方面更具有优势。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重大,今后其经济发展依旧离不开以高技术人才为代表的移民群体的贡献。

(三)改善国家形象

移民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是国家形象构建手段和传播途径之一。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以获取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拥护^[15]。“白澳政策”臭名昭著,国际社会都对其予以批评指责,澳大利亚国家形象因此受损。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澳大利亚关注移民非歧视及平等原则,通过社区服务促进移民融入,彰显多元包容的国家形象。

在难民问题上,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展现出包容的一面,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黄金时代”。但在20世纪末,为应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难民潮,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强制拘留难民政策,在境外建立拘留场所,对难民政策不断紧缩。2013年,澳大利亚实施了引发国际社会热议的“主权边界行动”(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这一措施有悖于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精神,不利于国家正面形象的塑造。近年来,澳大利亚履行难民义务,在2021—2022年间颁发超过1.3万个难民和人道主义签证,并且尝试推动社区直接为难民提供安置服务,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

三、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的特点

(一)围绕国家利益

移民政策是国家行政决策的体现和执行,澳大

利亚移民政策旨在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吸引高技能和高收入移民,以及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从政治角度来看,开放的移民政策可以丰富国家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通过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展现澳大利亚的正面国家形象。从经济因素来看,澳大利亚越来越注重选择那些拥有较高技能、创新能力、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的移民申请者,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从人口增长角度来看,其移民政策促进了人口增长、增加了劳动力,使得澳大利亚移民群体逐渐年轻化。

(二)政策灵活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变化进行调整和更新,以适应不同社会环境。一方面,澳大利亚定期对移民政策进行评估。内政部以年报的形式,对当年工作中的各类数据和关键事件进行分析,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变化,对下一年度移民政策予以调整和修订。如对不同类别的移民配额进行修改,以及对移民条件和要求作出调整,以引入国家所需移民。另一方面,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澳大利亚能够快速作出反应,及时调整政策,保障移民权益,积极应对危机。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放宽学生签证和打工度假者的工作限制,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帮助恢复生活生产。

(三)手段丰富

澳大利亚移民历史悠久,移民政策不断变革,其政策变化覆盖面涉及移民配额、签证类型以及积分制度等多个方面。在配额变化方面,澳大利亚的移民配额和移民类别不断调整,逐渐形成当前以技术移民为重点的移民政策。在签证类型方面,澳大利亚签证种类在变革过程中不断丰富,不仅为吸引人才而设立技术人才签证,而且也为家庭团聚类移民、留学生、人道主义移民等群体设计完善的签证种类。另外,签证服务不断优化,实现签证网上办理,提高签证发放效率。在积分制度方面,澳大利亚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对申请人的技能、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评估标准进行调整,以选择符合条件的移民。

四、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了实践检验,具有诸多切实可行的经验。虽然我国与澳大利亚的国情与文化存在差异,但其有益经验对我国移民政策制定、调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可在实践中予以参考。

(一)关注国家整体利益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能够根据国内劳动力需求、技能人才短缺情况以及经济状况及时调整移民政策,使其移民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首先,我国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也要从国情出发,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依据国家需求制定、调整移民政策。当前,我国的移民需求主要是高技术人才,对高技术人才的评价标准可借鉴澳大利亚的积分制度进行优化调整,吸引真正能为我国发展作贡献的技术人才进入并扎根中国。其次,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非法移民问题屡见不鲜。对于“三非”外国人,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形成科学的国际移民治理方案,在保障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前提下^[16],加大查处力度,及时对非法移民进行遣返,防止其对国内社会安全造成危害。除此之外,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对移民的需求与吸引力也不同。在制定、修改移民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地区差异,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应当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为全国移民管理工作提供先进经验。

(二)注重政策主动构建

政策被动变更所带来的冲击往往高于政策主动变更。移民政策是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影响群体广泛,因此需要在制定过程中主动构建具有前瞻性与灵活性的移民政策。从前瞻性来看,澳大利亚推出了《澳大利亚到2050年:未来的挑战》的规划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项政策。当前,我国移民政策制定应以《“十四五”移民管理事业发展规划》为基础,结合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关注全球发展趋势,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前瞻性移民政策,以保持政策的长期适应性。从灵活性来看,当前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移民政策需要适时调整,适应环境变化,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通过移民政策限制中国公民海外流动。面对此种情况,我国应主动调整政策予以反制,如完善相关反制法律、扩充反制手段等,以冲破单边制裁的限制影响^[17]。

(三)优化移民管理体系

在移民政策不断调整过程中,澳大利亚的移民管理体系也逐渐优化,形成法律体系完备、规则详细公正、管理科学高效的移民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移民法律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1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针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不够

明确,在各地基层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差异,国家移民管理局应积极推动移民管理领域法律修订完善。签证是筛选移民的重要工具之一,澳大利亚在移民政策变革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签证种类,使其能更好地发挥筛选作用。目前,我国普通签证有12类16种,与澳大利亚细致的签证种类相比,我国签证种类少,且缺乏签证转换机制。在高技术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应从细化签证种类、提升签证效力、完善签证转换机制和提升签证办理效率等方面予以优化提升。澳大利亚移民管理部门历经多次更迭,形成如今以内政部为领导的架构。在内政部和澳大利亚边境部队努力下,澳大利亚移民管理工作呈现出科学高效的局面。素质过硬的移民管理队伍能够保障工作顺利开展,国家移民管理局亟须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教育培训,强化执法监督,积极听取民众意见,建立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移民管理队伍。

(四)深化国际社会协作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人民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愈发强烈,移民活动也更加频繁。较过去而言,当今移民问题不再是靠某一国家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依靠国与国、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18]。在过去30年间,澳大利亚不断加强非法移民治理和移民安置的双边和区域层面的深入合作。在双边层面,澳大利亚积极与邻国展开合作,与印度尼西亚的边境执法合作已经成为澳印尼关系的支柱;在区域层面,澳大利亚通过“巴厘进程”展开区域内合作,促进全球移民治理。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强与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东盟等国际组织的联系,开展区域层面的移民领域合作,为国际移民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另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发挥自身影响力,积极与周边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在为两国人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还可在移民管理领域开展情报信息交流、执法人员培训、联合执法等合作。

五、结束语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演变受到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澳大利亚在面对国际社会变化、经济挑战和地缘政治动荡时,通过灵活调整移民政策,取得相对平衡的国家利益。未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仍将会以高技术移民为中心,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提升国家吸引力。通过研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革,可为我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完

善提供有益经验,使我国移民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 [1] DIBP. A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EB/OL]. [2023-05-20].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about-us-subsite/files/immigration-history.pdf>.
- [2] 麦金泰尔. 苏醒大陆: 澳大利亚史 [M]. 潘兴明, 刘琳,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2: 115.
- [3] 何河.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演进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2.
- [4] 张秋生. “白澳政策”的兴衰与二战后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 [J]. 八桂侨刊, 2014(1): 13-18.
- [5] 苏佳卓. 19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回顾 [J]. 滁州学院学报, 2016, 18(3): 23-26.
- [6] PRICE C A. Post-war immigration: 1947-98 [J].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1998, 2 (15): 115-129.
- [7] 张秋生. 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35-136.
- [8] 张玉洁, 颜廷. 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 [J]. 世界民族, 2020(2): 95-108.
- [9] 张秋生. 从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看澳大利亚未来移民政策走向 [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0(1): 89-96.
- [10] 张秋生.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主要制约因素探析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460-468.
- [11] DIBP. Annual report 2020-21 [EB/OL]. [2023-05-25].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reports-and-pubs/Annualreports/home-affairs-annual-report-2020-21.pdf>.
- [12]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programs [EB/OL]. [2023-05-26].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programs-subsite/files/administration-immigration-program-10th-edition.pdf>.
- [13] 张玉洁. 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下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变迁研究(1972—2016) [D].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 2019.
- [14] ABS. National, state and territory population [EB/OL]. [2023-06-01].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people/population/national-state-and-territory-population/latest-release>.
- [15] 孙有中.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 [J]. 国际论坛, 2002(3): 14-21.
- [16] 周新军, 张锡鸿.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我国移民遣返阻却事由的构建 [J].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 2023, 39(3): 26-33.
- [17] 梁秀波, 张弛. 美国基于移民政策的单边制裁措施及其反制研究 [J].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 2022, 38(1): 6-11.
- [18] 李琦. 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现状、成因及应对 [J]. 武警学院学报, 2020, 36(9): 12-20.

Research on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Changes and Its Inspiration

YANG Hanrui^a, LIANG Xiubo^b

a. Graduate School; b. School of Immigration Management,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Province 065000, China

Abstract: Australia is a typical immigrant cou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mmigration policy has been long and systematic. Since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its immigration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four periods: colonialism, “White Australia Policy”, multiculturalism and post-multiculturalis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 from the aspect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mage, and argues that the change of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 features a focus on national interests, policy flexibility, and broad adaptability to changes. China can draw reference from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 by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s, emphasizing proactive policy construction, optimizing the immi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Australia; immigration policy; change; driving force; reference

(责任编辑 刘彦超)